

2016年04月，頁205-211。

評 Linda Rui Feng, *City of Marvel and Transformation: Chang'an and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in Tang Dynasty China*

許凱翔*

Linda Rui Feng, *City of Marvel and Transformation: Chang'an and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in Tang Dynast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有唐一代，長安多數時間作為首都，位居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之中樞，同時又是唐代與西域交通的起點，而為官員、百姓、軍隊、外國使者或商人等各類人群匯聚之處，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過去學界對長安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¹然而，Thomas Thilo、王才強(Heng Chye Kiang)、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探討唐代都城的專著陸續出版後，歐美唐代學界已許久未有新作。²本書適時彌補了此一空白，且將研究視角轉向從各地前往長安參與科舉的士人，探索他們對首都生活經驗的敘述及其產生原因。

本書作者任教於多倫多大學東亞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參妹尾達彥，〈城市の生活と文化〉，收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編集委員會編；谷川道雄等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中譯見妹尾達彥，〈城市的生活與文化〉，收入谷川道雄主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317-385；榮新江、王靜，〈隋唐長安研究文獻目錄稿〉，《中國唐代學會會刊》，22(2003)，頁57-86；寧欣、陳濤，〈唐宋城市社會變革研究的緣起與歷程〉，收入李華瑞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293-357；陸揚，〈西方唐史研究概觀〉，收入張海惠主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96。

2 Thomas Thilo, *Chang'an: 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 (Weisbaden: Harrassowitz, 1997-2006); Heng Chye Kiang,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Victor Cunrui Xiong, *Sui-Tang Chang'an= 隋唐長安: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Toronto)，研究興趣在透過城市空間與文人社會網路之間的關係，探索筆記、小說等文體在唐代晚期的形成，本書為此課題的階段性成果。³書中以敘述(narrative)一詞，概括小說、筆記等文體，並以這幾類文獻為中心，由文人在長安生活經驗的書寫，反思城市空間對士人之影響，及其影響何以促使他們創作這些文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運用了人類學的闕限(liminality)概念，解釋士人在參與科舉之後，與開始仕宦之間的過渡階段。士人在此過渡階段，處於離開鄉里，浸淫於長安官場求取仕進，但尚未取得任官機會的角色模糊狀態，彷彿經歷一場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逐漸轉變為具備官員身分與文才的文人(men of letters)。⁴這些敘事的創作，多出自文人在闕限階段中的求宦歷程。同時，作者綜合 Henri Lefebvre 對社會空間的定義，與 Michel de Certeau 有關空間中日常生活實踐的討論，將唐代長安視作以文人生活為主的社會空間。⁵循此脈絡，長安變成文人進行各種活動的場域，並為文人創作敘事提供材料。

本書第一章探討唐代後期社會與文人結構變遷對文人身分意涵的影響。由於唐代選舉制度的成熟，社會階層間出現流動。文人由平民而入仕的過程，也隨此社會變遷成為敘事常見的主題。在這些敘事中，文人們多經歷闕限的狀態，且往往得歷經波折，才能轉變身分。例如〈李娃傳〉的主角進入長安後，因愛上李娃而散盡錢財。他後來為了謀生轉職為挽歌歌手，成名後卻被父親認出，而遭其父杖打瀕死。最後才在李娃的幫助下康復，終而取得功名。此一過程，體現其由闕限狀態到成為文人的變化。在這些變化的例子中，長安被描繪為文人求宦活動的空間，成為後者體驗闕限的地點，與身分轉變機制的一環。

3 作者相關論著參 Linda Rui Feng, "Youthful Displacement: City, Travel and Narrative Formation in Tang Tales"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8); "Unmasking Fengliu in Urban Chang'an: Rereading Beili Zhi (Anecdotes from the Northern Ward),"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2 (2010), pp. 1-21; "Chang'an and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in Tang Tal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1:1 (2011), pp. 35-68; "Negotiating Vertical Space: Walls, Vistas, and the Topographical Imagination," *T'ang Studies*, 29 (2011), pp. 27-44.

4 參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中譯本見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著，黃劍波、柳博贊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94-131。

5 Henri Lefebvr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Michel de Certeau, trans. Steven F. Rendal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第二章關注士人參與選舉的最終地點——長安，考察其地對士人吸引力之由來。士人受到求取進士的企圖驅使，同時被長安豐富多彩的文化吸引，在每年秋末考試時期從各地湧入長安。這類例行性的旅行，亦為文人闕限過程的一部份，長安因而發展為此一過程中的地理中心點。

第三章深入長安的街坊，說明敘事中對初入長安士人移動情況的描寫。前往長安參加考試者，其生活經驗深受當地城市空間結構影響。跟隨這些人的腳步，可以發現以嚴整坊市構成的長安城，其生活空間的發展，實際上並不平均，因而出現許多別具特色的坊。士人在進入首都之後，有時為複雜的城市空間所迷惑，甚至使其生活暫時偏離正軌。但是，透過累積在長安的生活經驗，他們在長安社會中也獲得賴以成名的文化資本。在首都的名聲，使他們更有機會在科舉中獲得成功。

第四章介紹士人在長安城中力求表現以博取名聲的現象。士人為了在考前聞名於官場，努力在公眾領域證明自身的文才。長安城內的空間，變成他們競演的舞臺。在考試前，他們尋求在公開場合創作的機會，以向大眾表現文學技巧；放榜之後，春末眾多新科進士出遊，加以大量群眾旁觀，也為他們帶來展現才華的時機。士人的名聲能否建立或維持，取決於他們在這類活動中的表現。

第五章聚焦於平康坊，討論性產業與考試文化在長安城內的結合。作者利用《北里志》等筆記，勾勒長安風化區中妓女、街坊、流言、交易等現象交織的圖像。士人或官員流連於平康坊中，使該地形成一資訊、欲望、資源流通的空間。初入長安求宦者，必須能夠辨別風流背後發揮作用的因素，進而可以展現文才，並建立自身人脈。

在全書之末，作者提到唐代晚期不同種類的敘事，反映長安社會空間中，隨著考試文化興盛產生的新經驗。身處求宦闕限階段的士人，其為炫才而創作的敘事，將書寫與城市空間聯繫在一起。由此可見，這些敘事不僅顯示九世紀唐人對長安形象的認知，同時與文人身分轉變的過程緊密結合。

本書由闕限與空間的脈絡，分析唐代晚期文人在時空中的變動。在時間方面，為由闕限轉變為文人的階段；在空間方面，是指士人離開原鄉進入長安，繼而在長安城內移動的生活經驗。作者以詳細的史料分析為基礎，將闕限的概

念與唐代後期文人的生命階段結合，為此前唐代研究少見的嘗試。至於透過空間理論分析城市生活與人群移動，則適巧呼應唐宋史學界近期的潮流。⁶這些皆顯示作者在選擇研究方法上的敏銳。作者先指出考試與文人闕限階段的關係，及長安對士人的吸引力，並依序討論士人探索長安、以該地為舞臺的發展，使其論述有層次的展開，並就九世紀筆記、小說等敘事的蓬勃，及這類敘事與長安生活經驗的關聯，為唐代文學與社會關係帶來精彩的分析。

再者，有別於熊存瑞著重考證長安的沿革、空間建置、管理制度的討論策略，本書通過唐代敘事帶領讀者進入城市內部，由敘事中對士人日常生活的敘述，思考這些作品賴以產生的時空背景，且利用筆記、小說、詩文、金石等文獻，佐以考古資料，為九世紀長安社會中的文人活動與城市空間進行詳實的描寫。加上作者對空間感的掌握，使唐代晚期長安文人的生活彷彿躍然紙上。

不過，儘管本書在方法上力求創新，論證亦稱嚴謹，但仍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對東西方學界相關成果的掌握與運用，在本書中似有失衡之虞。必須指出的是，將唐代文學發展與科舉、都城文化三方加以連結的取徑，妹尾達彥已有豐富成果。他曾析論科舉相關文學作品中隱含的權力關係，以「科舉文學」稱呼這類因應科舉而生的作品。⁷另外，他也考證取得進士資格後的宴集等一連串合格禮儀細節，指出這類公開活動對文人獲得長安社會的認可，以及塑造長安官民一體感的作用。⁸他以〈李娃傳〉為中心，探討九世紀長安規劃蘊含的宇宙論，及城內空間結構的分化，並討論唐代後期男女交往風氣與挽歌比賽等庶民文化。⁹至於文人以長安花街的妓女為對象創作詩歌或小說，在他看來是科舉

6 相關研究參吳雅婷，〈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7）；〈不安的邂逅——宋人於旅宿場所的互動及其空間印象〉，《新史學》，21：4（臺北，2010.12），頁141-202。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41-48。Cong Ellen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中譯本見張聰(Cong Ellen Zhang)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7 妹尾達彥，〈詩のことば、テキストの權力——9世紀中国における科舉文学の形成〉，《中国——社會と文化》，16（東京，2011），頁25-55。

8 妹尾達彥，〈唐代科舉制度と長安の合格儀礼〉，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律令制——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東京：汲古書院，1986），頁239-274。

9 妹尾達彥，〈唐代後半期長安と伝奇小説——『李娃伝』の分析を中心にして——〉，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編集委員會編，《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

社會重文輕武風氣下，文人期許自身成為才子的同時，將想像中足堪匹配自己的才女形象，寄託在妓女身上的結果。這種對男女關係的憧憬，是以文人赴京考試後與妓女往來為契機而形成。¹⁰ 他也強調將長安的發展，與九世紀後唐代在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轉型並觀，且把科舉社會的形成，視同這些轉型的一部分。在這些變遷的背景下，長安、洛陽的都市文化，成為促進白居易(772-846)等文人創作的重要因素。¹¹ 由妹尾達彥的討論，可知九世紀赴京文人的文學創作，無論主題關於考試或戀愛，都難免受到都城文化的推動，反映在九世紀的變遷之下，身處長安的文人被賦予或自身塑造的形象認同。然則，儘管在緒論中，作者曾表示獲益於妹尾達彥的研究，(頁 14，註 50) 在書目亦羅列了後者的部分論文，(頁 180) 但實際上只參考後者對〈李娃傳〉的考察。(如頁 76，註 33；頁 80，註 51；頁 107，註 65) 在分析長安空間與文學關係時，作者若能留意妹尾達彥的其他研究，對本書論述的深化應有一定助益。

而且，關於唐代選舉與文學的關係，程千帆、傅璇琮、王勛成等早有詳細討論，¹² 但書中僅見引用傅璇琮書，(如頁 94，註 17) 另外二書則未列於書目。此外，孫國棟曾以本書第一章論及的〈櫻桃青衣〉為例，以主角范陽盧生夢中經歷的唐代理想升官圖為經，考證唐代文官遷官的最優途徑，為文人身分轉變過程的制度背景，提供詳細的資訊。¹³ 盧生每一遷官階段顯示的不同意義，應有助於理解文人闖限過程的細微變化。又例如高木重俊由韻文、散文、小說等文體，探討作為科舉核心精神的至公之道，及唐代科舉社會的諸多樣貌，也與本書主題有頗多關聯。¹⁴

の諸問題》(福岡：中国書店，1987)。中譯見妹尾達彥著，宋金文譯，周蘊石校，〈唐代後半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39-583。

10 妹尾達彥，〈“才子”與“佳人”——九世紀中國新的男女認識的形成〉，收入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下冊，頁 698-727。

11 妹尾達彥，〈九世紀的轉型——以白居易為例〉，《唐研究》，15 (北京，2005)，頁 493-532。

12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

13 孫國棟，〈從《夢遊錄》看唐代文人遷官的最優途徑〉，收入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再版)，頁 74-90。

14 高木重俊，《唐代科舉の文学世界》(東京：研文出版，2009)。胡雲薇對此書有詳細評述，參胡雲薇，〈高木重俊，《唐代科舉の文学世界》〉，《早期中國史研究》，2：2 (臺北，2010.12)，

類似的情況，也可見於本書對士人赴京旅行的討論。作者談到首都對士人的吸引力，與他們在首都博取名聲的諸般作為，但對這兩者形成的原理未及深論。對此問題，甘懷真提出「名」是漢唐京城文人教養的依據與權力的來源。名由士大夫社會的公論所給予，來自文人間的互動。唐代將教養內容明定為文學，但選舉時仍是依據文人在士大夫社會獲得之名。長安的士大夫創造上層社會的文化標準，各地域的上層人物因社會網絡而與京城文化逐漸同化，形成以長安為主的京城認同，加強了京城文化的優越性。為求得名聲，前往長安社交圈，向上層人物借勢、借譽，與同儕溝通往來，便有其必要。這種權力結構促進交遊，也使長安成為全國性的社交中心。¹⁵寧欣則利用唐代小說，探討唐代中央選舉體制對舉人、選人、流外銓等流動人口的吸引，並考證這幾類群體在唐代後期的流向與構成變化。¹⁶這些討論突顯科舉社會的運作原理與文人結構變化，可補前述本書之不足。

綜合前述，可知本書對日本、臺灣、中國學界既有研究的掌握，似乎稍嫌不足。如此便引發第二個問題：本書在論述上的原創性，應置於何種學術脈絡加以評估？若跳脫闕限、空間等理論架構，重新審視本書論點，且將前述研究納入比較，本書三至五章對文人表現文才的討論，相對於研究方法上的新穎，在論點上似乎未能跳脫前人的研究業績。雖然這不妨礙全書核心問題的論證，但可能影響讀者對本書原創性的判斷。反之，若能與這些研究進行比較甚至論辯，從而突顯本書在相關議題之同異，或再前人基礎上另求新見，更可突顯本書的貢獻。

最後，本文想指出一個技術性問題。本書既以城市空間作為討論的背景，對於讀者而言，文人移動時的地理資訊，是理解其在城市內動向的依據。在以

頁 257-262。

15 甘懷真，〈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收入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187-198。另可參甘懷真，〈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3）。

16 寧欣，〈唐代長安流動人口中的舉選人群體——唐代長安流動人口試析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1（北京，1998），後修訂並改題〈城市流動人口與選舉——以唐長安舉選人為中心〉，收入寧欣，《唐宋都城社會結構研究——對城市經濟與社會的關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51-210。

文字說明的同時，若配合地圖呈現，使讀者能具體認知文人移動方向、所處地點，進而掌握文人所在城市空間的性質。也因為如此，以往唐代城市史的研究中，使用地圖以幫助說明，是常見且有效的討論方式。通覽全書，僅見緒論放置兩張地圖，一為秦漢唐渭水流域首都位置圖（頁 3），二為長安佈局的現代復原圖（頁 5），不僅數量過少，內容也過於粗略。在缺乏地圖指引的情況下，讀者若非唐長安的專業研究者，可能被淹沒於文字之中，不知文人身處何方。本書雖然側重人所認知的社會空間，但社會空間仍是以地理空間為基礎而形成。欲帶領讀者感受唐代長安的空間，在文字敘述之外，仍可利用地圖建立讀者對城市空間的感知。相關研究工具方面，較具代表性的唐長安歷史地圖，早期有平岡武夫編《唐代の長安と洛陽・地圖》，近者則有史念海編《西安歷史地圖集》，其他選擇亦多，應足供作者參考。¹⁷

總之，這可能是一本以歐美唐代研究者，特別是文學研究者為預設讀者的專著。本書運用人類學的理論，為文人與敘事的關係帶來不同的研究取徑，並以生動而不失嚴謹的筆法，開啟一扇觀察九世紀後唐代長安科舉社會的門扉，對筆記、小說等敘事的形成提供一說，為歐美唐代研究踏出新的第一步。

17 平岡武夫編集，《唐代の長安と洛陽・地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編集委員會，1956）；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